

# 民權思想與先鋒主義： 民國時期孫中山的政治主張\*

沙培德\*\*

## 摘 要

孫中山成年以後的政治思想，既忠於民權的原則，同時也遵循革命先鋒隊的理念，從而影響到他對未來憲政秩序的看法。儘管孫氏的政治性著作與演說通常含糊不清，而且自相矛盾，本文仍欲聚焦於他在1910-1920年代所關心的主要議題，藉以探討孫氏在民國成立後的政治主張。孫中山在國民黨改組為列寧式的政黨以前，便已經信從先鋒主義，而且將其先鋒主義奠基於連貫一致的認識論。從自由民主主義的理路來看，民權思想與先鋒主義之間的確存在著緊張性。然而，「非自由」的民主主義，亦即保留民權理想，同時又強調強而有力的領導，對於二十世紀初期具世界主義觀的知識分子來說，普遍具有吸引力。此一視野在邏輯上也奠基於一種樂觀的目的論，並預設了民主制度的普世發展歷程。

**關鍵詞：**孫中山、先鋒主義、革命、民權思想、非自由民主主義

---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大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辛亥革命百年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10月3-4日)，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主辦之“Workshop on Chinese Thought as Global Social Theory”(8-9 December, 2011)。感謝所有與會學者的評論意見，特別是朱泐源教授、山田辰雄教授和 Leigh Jenco 博士。他們皆有助於本文修改，儘管我對部份建議仍有所保留。至於本文的任何錯誤，仍然由我負責。

收稿日期：2012年1月16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10月4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1913年春天，辛亥革命已然失敗的想法，浮現在許多革命派人士的心中。他們重新努力，冀望達成所謂的「二次革命」，卻被袁世凱的軍隊輕易地擊敗了。就政治方面而言，1913年僅僅見證了袁世凱增強其權力；然而在思想方面，對於激進知識分子來說，卻是至為關鍵的一年。這一年，他們不但發展了新的革命策略和組織，<sup>1</sup>對於革命也有了新的體悟，認為革命應該是由職業革命家所領導而持久不懈的鬥爭。因此，革命家的角色即首次需要從意識型態去加以證成(justify)。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孫中山不但研擬出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成熟版本，而且也發展出一項我們可稱之為先鋒主義(vanguardism)的理論。因此若聚焦於孫中山成熟以後的意識型態，也就等同於試圖調和民權思想與先鋒主義。在此脈絡之下，以上兩項信條沒有任何一項可以稱得上是完整的意識型態，而是兩者同時變成孫文主義(Sunism)的重要成分之一。儘管孫中山的「訓政」理論對其先鋒主義來說十分重要，但先鋒主義並不侷限於此一理論。訓政理論認為在革命的情勢發展過程當中，一個民主的國家最終將會浮現；訓政就其自身而言，就是透過延遲民主而與之調和。但孫中山的先鋒主義依賴的是領導者之內在特質，而後者又訴諸於優越的知識。先鋒主義在此意義之下，指的是一種革命策略：由意識型態純正的組織來領導革命分子，並透過啓蒙的過程來指導落後的群眾。對孫中山來說，一個社會之所以迫切需要追隨先鋒的領導者，並不僅僅是由於文化上的落後使然，這套辦法同樣適用於民主國家。那麼在孫文主義裡，民主國家又意味著什麼？基本上，這是一個不自由的管理性國家(illiberal, managerial state)，透過普遍投票，直接或間接地決定由誰來取得領導權。孫中山的民權思想不能被草率視為虛飾門面，但也不能被理解為奠基於代表權(representation)的自由主義體制。可以說，「孫文主義」既保留了普遍民權，同時又支持政府的行動自由。

---

<sup>1</sup>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孫中山的先鋒主義及其民權思想，必須置於當時加劇的政治危機，以及某些文化特性的脈絡中，才能得到理解。下文將一一加以討論。袁世凱和軍人階層的崛起，以及 1913 年對國會的打壓，對當時一般城市知識階層來說，也許還可忍受；然而，袁世凱在 1915 年轉向君主政體，卻被認為是倒行逆施，他並因此成為反革命的標靶而受到廣泛的咒罵。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的原則在此時得到中國菁英的普遍支持，儘管對於共和原則所包含的內容存在異議和含糊之處，但他們對於革命應竟全功這一點還是有共識的。<sup>2</sup>此處的重點，在共和革命的「敘事」(narrative)裡，袁世凱變成一個反英雄，也是罪魁禍首。但這又不僅止於罪惡而已，袁的舉措不符合當時的民主潮流，腳步倒退。特別是對孫中山來說，全球逐步走向民主政治，意味著中國也必須為了民主而繼續奮鬥，並且可望很快就會建立起一個長治久安的共和政府。不過，這一切並不會自然發生，或是一蹴可幾。孫中山在 1913 年已然明白：他需要一個組織嚴密、擁有高度紀律的革命政黨來推翻當時的政權，然後再循同樣的途徑——組織與紀律——來領導全國。在此基礎之上，民主才可以建立。

從 1918 年往回看，或許有感於新近發生的俄國革命，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並未失敗，而是僅完成兩項任務中較簡單的第一項任務。辛亥革命雖破壞了舊秩序，但並未建立新秩序，進行「重建」的工作。<sup>3</sup>革命的重建工作有三個階段：軍政、訓政與最後的憲政。<sup>4</sup>在短暫的軍事「破壞」階段之後，隨之而來的訓政是為憲政主義作準備，在革命的中央政府指導之下，透過地方自治來實現。政治上的「重建」集中在中間的階段，而經濟發展在憲政主義

---

<sup>2</sup> 這並不是說所有支持共和主義的人都贊成革命，而是說他們和自認為是革命派的人有共同的基本預設，或一組目標，抑或一套「敘事」。這也不是說，在當時所有的議題上（如社會主義、婦女權利）他們都是「進步的」，而是說他們根本無力認知共和主義之外的選擇。甚至於那些支持清廷復辟的人（他們是形形色色的一群人），也是由文化認同而非政治理論所激發。參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清遺民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轉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sup>3</sup> 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下略），《國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冊 1，頁 409。

<sup>4</sup> 革命有明確的階段性，這個觀念在 1905 年的同盟會宣言中已經出現，但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花費相當多的精力加以充實。

(constitutionalism)之下，仍舊會持續進行。

孫中山從革命的樂觀態度轉變為堅定的決心，這種轉變也在世界上其他一些知識分子身上出現。在 1905 年到 1912 年之間，鄂圖曼帝國、伊朗、墨西哥、葡萄牙和俄國以及中國都發生了革命（其他國家也有民主運動，獲得程度不一的成功）。所有的民主革命除了葡萄牙之外，在幾年內都沉寂了下來。最近社會學家 Charles Kurzman 提出，舉世改革派的知識分子是促進並領導這一系列民主革命的關鍵角色。只要這些知識分子的人數夠多，他們就會形成共識，他們作為領導的社會階層，能掌握並導引歷史趨勢，從而信心滿滿地和過去決裂。<sup>5</sup>至少曾有一段時間，其他階層接受知識分子的領導霸權。容我在此補充：他們的自信與樂觀，來自於他們擁有一套進步的「敘事」觀點，以及他們有能力說服其他質疑者，他們這套「敘事」是精確無誤的。追隨知識分子（或與其不謀而合者）的各種群體，包括了資產階級、工人和軍隊。帝國主義列強的角色也同樣至關重要。一般來說，這些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皆認為，基於他們對於現代政治規範的知識，他們擁有較為優越的能力從事領導，但當時他們仍然尚未發展出關於先鋒主義的明確理論。

「知識分子革命」或許比「民主 / 資產階級革命」的提法更具概括性。知識分子至少和商人一樣是跨國界的，但其革命的結果，既不是民主政治，也不是財閥政治，更不是知識分子的統治，而是促成職業革命家的形成。以孫中山為例，這種轉變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經顯露了跡象。如果他不是一位職業革命家的話，又是什麼呢？然而，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是一種毫無規範可言、隨意組織而成的事業：由一些人帶著相對較少的追隨者包辦。我認為在追求進步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ist-socialism)與講求紀律的革命主義(revolutionism)間

---

<sup>5</sup> Charles Kurzman, *Democracy Denied, 1905-1915: Intellectuals and the Fat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至於結果：「知識分子可能過份高估了他們的歷史命運，且看他們的影響力終究急速隕落。但是當他們的影響力仍在時，他們的自信至關重要。這種自信產生了團結與動力，並且成功地促使知識分子成為支持民主的行動派。」(p. 260)為了強調二十世紀初期革命的共同結構，Kurzman 有可能低估了不同群體所扮演的獨特角色：譬如俄國革命中的工人，以及辛亥革命中的軍隊。但知識分子無疑的確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的平衡，在 1913 年間似乎有所轉移。正如 Edward Friedman 所指出的，孫中山在 1914 年創立了中華革命黨，繼續與袁世凱對抗鬥爭。中華革命黨是高度組織化的：領導者的話如同法律，所有的成員都必須嚴格服從；只有那些完全獻身於革命，以及徹底忠於領導者的人才能加入。<sup>6</sup>當革命完成之時，國家將由黨來領導，就像黨員之於領導者一樣。在 1914 年，孫中山已預見一個長期而不確定何時會結束的訓政「革命時期」，想當然耳要由黨來直接控制。<sup>7</sup>重點不在於重整國家，而是組織一個有紀律的政黨來治理國家。真正重要的敵人不是像袁世凱這樣明目張膽地對抗歷史潮流的人，而是派系鬥爭與墮落倒退。當然，這一切都未曾落實。中華革命黨在一開始就被迫妥協，也依舊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援與群眾的支持。孫中山只得再次重新出發。

## 革命與領導權：孫中山的早期觀點

在 1911 年之前大約十五年，孫中山努力不懈地宣傳革命的真理。很自然地，他的典範之一是改朝換代的革命方式。他說，今天的革命家需要像商湯和周武王一樣，他們雖然使用殘酷的暴力，但卻是為了安撫百姓，「故今人稱之為聖人」。<sup>8</sup>不過，孫中山當時主要是宣揚一種平民革命的觀點，降低聖人所扮演的角色。眾所皆知，孫中山在此一時期的撰述不多，他將革命宣傳交付其他人像是汪精衛和胡漢民之手。但在 1908 年，孫中山捲入了人民是否有能力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創造歷史，或者只能遵循歷史法則之爭論。具體地說，孫中山企圖反駁特定的改革派（反革命）論點，他們認為聖人、英雄只是自然法則的消極載體，這意味著有組織的起義並非順應自然。<sup>9</sup>孫中山首先反

---

<sup>6</sup>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chap. 3.

<sup>7</sup> 關於訓政階段應該持續多久，孫中山做過幾次不同的估計，有時候又有所保留。

<sup>8</sup>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下略），《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1986），卷 1，頁 226。

<sup>9</sup> 這次的論辯發生在新加坡的報紙上。《孫中山全集》，卷 1，頁 386-389。

對將「自然」的觀念應用於社會，因為自然指的是科學的自然法則。而社會則會經歷「時勢」的變遷。相較於改革派的觀點，孫中山的論點不在於商湯、周武王或美國的華盛頓擁有人民的自然支持，而在於「革命者，大聖人、大英雄能為，常人亦能為」。按照孫中山的看法，正是夏桀之殘暴引發了民眾的反叛，否則人民是不會追隨商湯的。同樣地，英國在美洲從事苛捐雜稅。這些人為的政治行動沒有什麼「自然」之處，華盛頓本人也只是團結一致的國民革命運動中的一員。孫中山總結說，因此，中國的革命就在於喚醒民眾。

孫中山認為「聖人英雄」並不是那麼重要，革命實際上是對於壓迫的一種自然反應，在這個例子裡其實是與改革派的論點相呼應的。改革派曾主張說，歷史上的動亂都是以民眾為基礎，就像商朝、周朝與美國獨立運動之興起一樣，暗示中國現在的情況並不適合以同樣的方式促成革命。孫中山基本上不認為領導人物是組織能手（聖人），而是「覺醒者」，但是他仍然明確地認為人民才是自己歷史的創造者，以國家群體的形式來創造歷史。革命是一種群眾的行動，是整個民族的興起。就此而論，孫中山譴責幾十個世紀以來的專制統治，幾乎等同於他對滿人的譴責。他注意到專制統治的「毒素」危害之深。在一場1906年的演講中，孫中山似乎讚賞歷史上對於專制的反抗。<sup>10</sup>但是與此同時，他的論點卻是直指這種反抗未能奏效，因為這些「草昧英雄」無法從事革命。這類人彼此相爭，結果往往分裂國家而非統一全國。因此今日的革命家必須要保持團結。中國真正的威脅不是外敵入侵，而是內部分裂。解決之道在於群眾的革命與治理。

此種觀點隱含組織甚至是紀律的重要性，但孫中山在其演講中接著關注的卻是民眾的情感，而非領導或政黨結構。甚至當他在1912年元月成為民國的臨時總統之後，他對於尚未宣告效忠民國之軍隊的勸告，只是古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sup>11</sup>這當然是在呼籲加入革命的行列，但同時也是宣告政體必

---

<sup>10</sup> 《孫中山全集》，卷1，頁326。

<sup>11</sup> 《孫中山全集》，卷2，頁11-12。

當反映民心所趨的信念。孫中山諄諄教誨其他人該有自制的行爲，至少在表面上樹立了模範。當孫中山提議要解職讓位給袁世凱時，他特別公開提及袁氏擁有更好的經驗，<sup>12</sup>皈依共和原則的袁世凱是個合適的領導人。孫中山最初不信任宋教仁透過建立政黨以投入 1912 年的國會選舉一事，乃是眾所皆知的，這反映了他期望政治菁英都能團結一致。<sup>13</sup>當孫中山於 1912 年四月辭去總統一職時，他聲言革命黨的目標就是聯合中國人民，推倒壓迫人民的政府，促成國家的興盛。<sup>14</sup>其宗旨爲統一、穩定與進步，終至世界和平。這些宗旨都是中國人民的職責所在。在「先知先覺之人」這個關鍵觀念的早期用法裡，孫中山回顧說：「當民國初立時，人民頗有不知民國之爲何義，文明進步之爲何義，凡吾輩先知先覺之人，即須用從前革命時代之真摯心，努力進行，而後中華民國之基礎始固，世界之文明始有進步，況中國人民本甚和平。」<sup>15</sup>

孫中山尚未質疑在革命時期或共和政治裡，人民及其領導者之間的關係爲何。人們過去時常注意到，孫中山以臨時總統的身分致祭明太祖，代表對於漢族認同的宣告，但其實這也是對於領導權的宣示。他將「大聖至神、仁文義武」的明太祖神化爲兼具文武德性與成就的典範。<sup>16</sup>在比較民國和明朝將中國人從外人壓迫之中解救出來這一方面，孫中山暗示了兩者在領導權上一定程度的相似之處。但是他也擔憂民國如何維持不墜。與專制政體不同，共和依靠的是國民的政治能力和公共道德，<sup>17</sup>然而中國一般民眾仍然無知，因此支持共和之人，絕不可懈怠。也就是說，雖然革命似乎已經成功，但是政治工作才剛剛開始。經過 1912 年的發展，孫中山才同意宋教仁的看法：政黨是從政的適當機

<sup>12</sup> 《孫中山全集》，卷 2，頁 99-100。孫中山私底下對袁世凱有所保留，但在公開場合則是對之非常熱情。

<sup>13</sup> David Strand, *An Unfinished Republic: Leading by Word and Deed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p. 39-42; 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trans. Janet Lloy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3-235.

<sup>14</sup> 《孫中山全集》，卷 2，頁 317-318。

<sup>15</sup> 《孫中山全集》，卷 2，頁 318。

<sup>16</sup> 《孫中山全集》，卷 2，頁 94-97。

<sup>17</sup> 《孫中山全集》，卷 2，頁 381-382。

制。在共和立憲國家裡，政黨為權力的關鍵核心。<sup>18</sup>當他謹慎地暫時接受議會政治時，孫中山試圖以政黨內閣作為國家統一的基礎，而政黨內閣則奠基於國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之上。最終在共和政體裡，權力仰賴於國民心力的統合。在君主專制國裡，權力集中在少數人之手，但在共和政體則是分配給人民全體。至少那些實際掌握權力的人通常是大多數的人民，因為他們直接選出其代理人。上述體制之所以能夠有效運作，仰賴的是代表原則。孫中山承認在實際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握有權力，或是能平等地參與治理。但在法律原則上，主權存在於國民全體，國家統治機關的構成乃是出自人民的意志。孫中山並未區別行政決策或統治意義上的權力，和法律主權意義上的權力。他認為，既然不是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能力，人民就只能接受這種搭配性的角色。此時孫中山菁英主義的觀點已經相當明顯，後來更連結到革命組織之上。總是有少數特出的優異人才來指導與團結尋常百姓。他們組織政府，並代表人民，透過政黨的方式，以一定程度的合作來實際控制政府機關。

在 1913 年初，孫中山認為政黨是維持共和秩序的關鍵。<sup>19</sup>政黨自身為民主機構，因其政綱乃由全體黨員所決定。在權力上，政黨追求與其政綱相符的政策。孫中山在此處區別了政黨在民主共和國與君主立憲國的重要差異。政黨在兩者之中都能維持社會秩序，但在君主國裡，政黨是制衡政府之用，而在民主國裡則能促進民主和自由。相反地，若無政黨，民主則無從發展以追求人民的福祉。這裡有趣的是，孫中山否認在共和國中，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任何鴻溝，或至少兩者的利益有任何分歧之處。

孫中山繼而闡述內閣制與總統制的區別，發現前者由於直接基於政黨而來，因此更能反映民意。<sup>20</sup>美式的總統制必須賦予單一個人絕大權力，以維持聯邦體制下的國家統一，而內閣制則能較為靈活地轉換權力。無論如何，孫中

---

<sup>18</sup> 《孫中山全集》，卷 2，頁 396-397：〈國民黨宣言〉，1912 年 8 月 13 日。這份宣言不是由孫中山撰寫的，但他同意並推演其邏輯。參閱 Edward Friedman,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chap. 2.

<sup>19</sup> 《孫中山全集》，卷 3，頁 43-44。

<sup>20</sup> 《孫中山全集》，卷 3，頁 44-45。

山信心滿滿地認為，凡有利於人民者，皆有利於國家。君主政體因為不聽從民意，終究會衰弱不堪，也正因如此，其政策是自私自利且違背現實的。共和政體之所以能繁榮昌盛並維繫秩序，正是由於能聽從民意，因此能根據現實制訂政策。在孫中山的論證中隱含的意思是，國家應該為民所享(for the people)，但不是由民所治(by the people)。不過，當孫中山在 1916 年再次思及君主國與共和國之間的差異時，他注意到共和國有賴於民眾力量的支持。<sup>21</sup>此時他對於中國民眾的軟弱無力已多有體會，但隨著袁世凱之死，孫中山仍然堅信，只要人民能負起責任，一定可以達成共和的目標。起碼在此處，孫中山並未關注先知先覺者的特殊角色，他很快地又回到革命黨組織的問題上。

## 「怎麼辦？」

這是像孫中山這樣的行動主義者常常遭遇到的問題，特別是在辛亥革命表面上成功之後。在更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有必要重溫一下列寧所發展的「先鋒主義」。列寧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一書寫於 1902 年，是為了解決他視為改革而非革命的歐洲和俄國社會主義運動。這並非孫中山當時關注的焦點所在。而孫中山對於列寧無產階級專政的目標也不感興趣。但兩人都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在一個壓迫人民但同時進行改革的國家中，如何領導革命。孫中山晚年雖然獻身於民主化的最終實現，但他已經明確地摒棄立基於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的西方式政黨民主。儘管依舊支持某種社會主義革命，但他也明確地拒斥立足於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孫中山從列寧那裡學到最多的是政治技術(political technique)。列寧在 1902 年極力主張創造一個政黨來領導工人從事革命，這樣的想法遭到大多數社會主義者的反對，但經過必要的調整之後，對孫中山來說，卻是極其自然而可接受的。與本文討論相關的重點是：列寧排除「自由」作為革命組織的原則，以及他對鎮壓批評聲浪

---

<sup>21</sup> 《孫中山全集》，卷 3，頁 349-351。

的做法加以辯護。<sup>22</sup>列寧主張在俄國的專制政體下，需要一個秘密的、甚至是陰謀顛覆政府的政黨。在此一政黨中，民主程序是不切實際的（儘管如此，同志間的相互信任以及民主的精神，應該會降低形式上的民主程序之需求）。列寧暗示這種革命政黨在像德國這類較為自由的國家，並非是全然必要的。但是讀者可能會推論說，革命政黨必然是陰謀論的(conspiratorial)。

這一切引發了一個問題：「誰是裁判？」<sup>23</sup>答案似乎是革命領袖，因為具備理論素養，能夠掌握完整的理論，加上具備主導真正的革命理論之地位，因而能夠脫穎而出。因為「先鋒者的角色，只能由一個具有先進理論的政黨來擔任」。<sup>24</sup>列寧評論說，「社會主義」本身並不是工人的產物，而是由像恩格斯與馬克思等「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和有資產的人所提出的。<sup>25</sup>眾所皆知，列寧的結論是工人階級自身只能發展出「工聯意識」(trade union consciousness)。不過，此處和孫中山相較，我注意到列寧從未將工人貶低為愚笨的，或在文化上落後的。他傾向於將工人們視為完全有能力理解總體革命的需求，只是需要一點點刺激和某些指導。<sup>26</sup>列寧真正的目的是攻擊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推動促進工人們的「自發性」，只是為了掩飾自身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真正革命家的任務，就是教導工人們其鬥爭基本上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根據列寧的看法，工人在歷史上已經成為反對帝王專制的主要力量，但是他們必須先理解超出其工廠之外更廣大的政治脈絡，才可能形成這種力量。革命家必須職業化(professionalize)，以全職從事理論、組織與宣傳等革命工作。而且身為職業的革命家，他們的理論比起其階級背景更為重要。

在當時，托洛茨基(Trotsky)的回應是批判列寧強調黨中央的權力，也就是

---

<sup>22</sup> Henry M. Christman, ed.,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7), p. 57.

<sup>23</sup>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68.

<sup>24</sup>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70.

<sup>25</sup>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p. 74-75.

<sup>26</sup> 爲了反對那些認爲革命工人應該留在工廠裡的想法，列寧敦促這些了解革命之理論與實踐，乃至於革命政治的工人，不應花費時間在工廠勞動上，而是應該成爲運動的全職（職業的）組織者和宣傳家。

我們現今所稱的先鋒主義，托洛茨基則稱之為「包辦替代主義」(substitutionism, *zamestitelstvo*)。<sup>27</sup>托洛茨基擔憂的是令人心寒的獨裁專制：黨的組織替代了整個黨，接著是黨的中央委員會替代了黨組織，最後由一個「獨裁者」替代中央委員會。在托洛茨基看來，列寧主張的原罪在於：黨取代了無產階級，創造了一個由智識革命分子領導的陰謀集團，而不是由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政黨來領導群眾運動。不過，托洛茨基隨後放棄了此一立場，也不再提及包辦替代主義。事實上，列寧和托洛茨基兩人皆認為時代潮流是走向革命，而且需要知識分子來啓蒙工人階級。列寧和托洛茨基假定在革命的過程當中，「革命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將會代表廣大的人民群眾。然而他們兩人都無法保證在實際上真會如此。二十世紀的諸多革命（包含中國革命）都是由政黨所領導的運動促成，然而革命一旦成功，黨國體制便跟著產生了。

對「自由」的懷疑、採取陰謀手段的專職革命先鋒隊、對人民進行家父長式的指導、徹底反對專制政體，這些都是孫中山成熟的意識型態中的幾項主要信條。孫中山的「菁英主義」在過去的歷史研究中已有廣泛討論，特別是西方與日本學者。此一菁英主義通常被認為是有危害的——預示了日後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獨裁，或者對於孫中山的民權思想來說，有前後不一的矛盾。<sup>28</sup>批評孫中山是合理的，但是我們可以將民主菁英主義(democratic elitism)或菁英式的民主(elitist democracy)，視為所有現代政治思想家所面臨的問題。孫中山無法解決此一難題，但其他人也不見得能成功解決。孫中山在 1919 年出版了一本

<sup>27</sup> Isa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88-97. See also Tony Cliff, "Trotsky on Substitutionism," in Tony Cliff, *International Struggle and the Marxist Tradition* (London: Bookmarks, 2001), pp. 117-132.

<sup>28</sup> 在孫中山傳記中，對此前後不一的矛盾，基本上採取同情立場，並加以強調：Marie-Claire Bergère, *Sun Yat-sen*, pp. 374-381；反民主的菁英主義可參見山田辰雄，〈序論——現代中国における代行政主義の伝統について〉，《歴史のなかの現代中国》（東京：勁草書房，1996），頁 1-9，以及橫山宏章，《中華民國：賢人支配の善政主義》（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頁 51-63。山田辰雄同樣正確地指出，孫中山理論之重要性，在於革命會以獨特的政治階段來進行，及其對於 1920 年代國民黨重組的具體步驟之設想。參見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の研究》（東京：慶応通信，1980），頁 14-104。此種研究取徑強調的是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然而，我們也可以追索孫中山思想中連貫而根本的民主途徑。

篇幅相當長的《孫文學說》，首尾一貫地陳述其政治觀點。全書處理了革命不同階段、五權憲法、發展到當時的革命歷史，乃至於宣誓方式等等。這本書至少有部份是為了回應當時的思想騷動。<sup>29</sup>此處我將以這本書來凸顯孫中山如何計劃進行革命。此書是他對於「怎麼辦？」這個問題最完整的闡釋，同時也代表他從 1911 年以前（甚至包含中華革命黨時期）之盲動主義(putschism)活動以來的轉變。孫中山新革命理論的關鍵處在於領導問題（亦即先知先覺者與追隨者的任務），以及知識與行動的問題。孫中山首先注意到，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無論如何成功，仍導致政治上更為嚴重的壓迫與經濟上的痛苦。然而依照他的理解，革命的失敗並不在於革命本身，而是在於革命分子的理論思想錯誤。他們這批革命分子太早停止前進的腳步了（孫中山可能想到的是他自己，但並未明說）。何以他們停止得這麼快？因為他們假設「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孫中山強調這個錯誤深植於中國思想的根源，這是革命黨遭到嚴重削弱，以及諸多行動終歸無濟於事的深層原由。孫中山抱持著一種唯意志論的樂觀假設：正確的行爲有賴於正確的觀念和意志，如此也就必能獲得想要的成果。

對孫中山來說，「知難行易」此一真理的優點，在於使中國人能放心大膽地行動。也就是說，使人不再擔憂採取行動有多麼困難；但要如何行動？這才是困難的問題所在。答案是取決於知識。由此又衍生出更困難的問題：知識從何而來？孫中山將他的方案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加以區隔。<sup>30</sup>他首先列舉了幾個例子，以顯示行動並不怎麼費力。以飲食來說，大家都知道如何飲食，但是只有生物學、醫學、衛生學、物理學和化學的專家才真的了解，當我們進

<sup>29</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351-422。

<sup>30</sup> 余英時認為，孫中山的知行方案雖然明顯地反對《尚書》與王陽明，但最好從孫中山的傳統主義那一方面來加以觀察。因為知識 / 行動此一範疇乃是中國哲學的核心，而且孫中山自認為他的觀念反映了對於孔子的正確理解，也與朱熹和戴震強調知識的優先性之觀點相符。參閱 Ying-shih Yü, "Sun Yat-sen's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hu-yuan Cheng, ed., *Sun Yat-sen's Doctrine in the Modern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p. 97-98. 然而，我不認為孫中山的觀點特別來自於中國傳統。孫中山的確對於中國的成就相當自豪（從烹飪到道德），這樣的態度也無疑能在相當程度上解釋他對五四反傳統主義的由衷厭惡，但是他明確地批判傳統的認識論。

行飲食活動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孫中山從跨文化的烹飪之法乃至於生理層面加以探討，篇幅相當驚人。金錢、作文、建築、造船、運河、電學與化學，都是同樣的道理。儘管人類尚未徹底了解其成就的基礎，但顯然還是能有很大的成就。然而孫中山真正的論點是：行動乃伴隨知識而來。這是領導的首要原則，孫中山引用孔子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sup>31</sup>他認為這也是普世的真理。除了應用到今日的社會，孫中山發現這項原則也適用於文化演進。人類的進展是從完全無知而行動的原始時代（不知而行），進展到先行動而後理解的文明時代（行而後知），最後才到現今的科學時代，人類憑藉知識的基礎而採取行動（知而後行）。讀者可能會因此推論，處於科學時代，大多數的人都已獲得真正的知識，或者至少有能力這麼做。不過，孫中山卻指出，很少人真正接受過科學的教育。<sup>32</sup>他的文明演進三階段論指的只是文明的領導者：那些總會採取行動的人。每一個時代的人都可以區分為做出新發現和新發明的先知先覺者，仿效先知先覺者的後知後覺者，以及其餘那些順從附和的不知不覺者。

我們正處於一個科學的時代，這點對孫中山思考知行關係而言十分重要。他暗示說，在一個較為簡單質樸的時代，人們總是有辦法以行動為基礎來達成事情。讀者可能會因此推論，既然行動如此容易又有效，那麼知識就不是必要的了。但這正好與孫中山的論點相反，因為他主張在此一複雜、科技尖端發展的電報和鐵路時代，知識必須位於前列。對於孫中山來說，這項基本的真理不僅適用於物質世界，也適用於人文社會。進一步而言，這也是樂觀的理由，因為有這麼多前所未見的知識可加以利用。具體來說，中國可以英國、美國與日本等大國為借鏡，學習其長處和短處，而且正由於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是完美無瑕的，中國人才能從中受益。

但是究竟該如何進行？答案就是透過正確的理解。「夫事有順乎天理，應

---

<sup>31</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381。原文語出《論語·泰伯篇》。

<sup>32</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384。

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是也。」<sup>33</sup>不過，孫中山也似乎認為，沒有一位領導者的能力大到足以造成與國家之基本「心理」不一致的根本變革。不是華盛頓和拿破崙決定了美國與法國革命極端不同的發展方向，而是恰恰相反：美國推舉出華盛頓而法國推出拿破崙，以與兩國各自的革命自然發展相一致。<sup>34</sup>孫中山真正的意思是，基於正確知識的正確領導，能夠創造出有助於革命改變的環境。如果啓蒙後的法國還出現拿破崙，那麼落後的中國會出現袁世凱，也似乎就是理所當然的了。但孫中山要說的是，假如革命的領導者們當時能好好理解 1912 年的局勢，他們便可以從事「訓政」，畢竟人民是可以教育的。教育人民的責任，正是歸於由先知先覺者所領導的革命政府。好幾個世紀以來的專制已經造成中國人民的「奴性」，但他們可以經由訓練以理解自身的權利。在此意義下，人民就好像過去君主時代下的嬰兒一樣，而革命黨就像他們的攝政導師。然而，孫中山指責革命黨由於自身的無知，未能負起他們的責任。他們的行動是容易進行的那一部份，也就是推翻滿清，這是革命的破壞階段，但他們的知識是不充分的。這裡指的是理解如何進行革命的建設階段這個困難的任務。就其正面而言，既然樂觀的孫中山能鼓吹正確的知識，那麼具體的建設事業就應該容易達成，畢竟知難而行易。

孫中山在 1924 年四月的〈建國大綱〉中綜述其「訓政」的基本原理。我們可以說，就是以革命建國。<sup>35</sup>建國的首要任務，就是由革命政府來為人民提供物質所需，並普遍地發展經濟。其次為建立民權，透過改進人民的政治知識和能力，使他們能夠選舉和罷免候選人、發起並行使公民投票權。<sup>36</sup>民族主義

<sup>33</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409。這裡仍然沒有回答任何一種知識（無論對錯）從何而來的問題。或許孫中山認為具有特殊的聰明才智之人，能夠從行動中推衍出知識。這是在當時思想界中盛行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所主張的，但他從未如此說明。而且一般說來，孫中山認為知識是從先知先覺者的內在稟性所產生的。

<sup>34</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390。

<sup>35</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623-625。

<sup>36</sup> 根據《孫文學說》，訓政階段將持續六年（《國父全集》，冊 1，頁 388、392）。但在其他地方，孫中山對於期限的問題頗為含糊。

僅僅排到第三位。但可以假設革命已經使民族主義取得力量，因此不再是第一優先。無論如何，孫中山強調習見的軍政、訓政和最後的憲政政府三階段。值得指出的是，他假設「政府」未來在控制軍隊方面不會有任何問題，大概是（不過並未明確表示）因為軍隊到時早已完全革命化(revolutionized)。一旦秩序建立，訓政便可開始，由政府的代理人來幫助地方建立縣級的自治機關。代理人將是受過訓練，而且還是經過考試合格之人。不過孫中山並未說明政府首先將如何找到這些人，以及這些人的數量是否足夠。實際上，他將地方自治政府定義為人口普查、警衛、民兵、基礎建設以及公民訓練。當人民已經完全履行他們身為國民的義務，並且獻身於革命的原則之時，地方自治政府便可以生效。孫中山也討論到一些細節，包含土地丈量與稅收、地方與中央政府、憲法以及其他政治議題。這些不是本文的關切焦點。但是他堅持官員與選舉代表都必須通過由中央政府核可的考試，則值得注意。這好像是在說，未經考試的人民可以被授與投票權，但不能被賦予直接的統治責任。當全國憲政階段最終來臨時，中央政府的立法院將由人民普選；但孫中山似乎是將行政院官員的遴選以及罷免、創制和複決權交給立法院。<sup>37</sup>他的視野因此是層級式的代表制(layered representation)或間接民主。

## 政治平等與民主領導

我認為支持民主是孫中山的基本信念。不過，即使我們同意孫中山信奉民主，我們也必須同時認知到他對自由主義的拒斥。我在以下將會論證，孫中山

---

<sup>37</sup> 孫中山在這一點上並未前後一致。可以這麼說，他傾向於主張人民保有創制和複決權。儘管他並未具體說明人民如何行使，或者在政府的哪個層級上行使這些權利。就此而言，讓我們討論一篇孫中山於 1922 年撰寫的、相對較具自由主義氣息的文章：〈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收入《國父全集》，冊 2，頁 351-354。孫中山此文基本的論證，關注的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適當的權力分配。大體上是一篇對於反聯邦主義(anti-federalism)的辯護。不過，此處的重點是，孫中山指出若想建立真正的普遍民權，關鍵在於憲政規範。也就是說，只要真正的權力在於人民，就不需要害怕中央集權制。孫中山在此預見其五權憲法中包含了對於中央政府的制衡，並討論到縣級政府做為行使「直接民權」的場所。

對於民權的視野混合了非自由的先鋒主義(illiberal vanguardism)。<sup>38</sup>最起碼我們必須承認，他很明確地懷疑自由的原則，諸如個人主義與有限政府。事實上，孫中山一直在尋找一種非自由形式的民主制度(non-liberal form of democracy)。

在 1924 年的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第二講中，孫中山說中國人不需要「自由」，因為他們不像歐洲人那樣，中國人向來已有很多的自由，並將之應用於各種實際用途。<sup>39</sup>他的論點是，傳統的君主政體只要求人民納稅，除此之外便聽任人民過他們自己的生活。孫中山爭辯說，中國人已經因為享有太多的「個人自由」而嚐到苦果，意思是新文化運動正好走錯了方向。

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法也不同。到底中國為甚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一塊堅固石頭一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裡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錯用了自由之過也。我們革命黨從前被袁世凱打敗，亦是為這個理由。<sup>40</sup>

孫中山並未攻擊自由這一觀念，但他也不視其為民權的構成要素。他此處的評語充分顯示其非自由(illiberal)的立場。孫中山顯然是想要以個人的自由來換取群體的團結。

同樣地，孫中山也爭辯說，平等並非中國最急需的要務。對他來說，平等

---

<sup>38</sup> 可能比較適當的說法為，孫中山信仰的是「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而非「民主」(democracy)（兩者都可以「民權」一詞來表達）。如果自由主義是透過制衡政府來尋求限制民主的話，不主張對政府加以制衡的孫中山，則是企圖透過其他手段來限制民主制度。

<sup>39</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67-76。

<sup>40</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74。

不是自然的，社會可以增加或減少天生的不平等。<sup>41</sup>貴族制度擴大了天生的不平等（也就是自然的差異），將之強化為世襲制度，這也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就像缺少自由一樣，歐洲也缺少平等，因此才會引發特別強烈的反應。孫中山暗示，這樣的反應在歷史上以自由和平等的理論形式出現，導致良好的結果，亦即產生革命；但是其學說既不真確也不科學，而且在中國會導致災難。企圖創造出絕對的平等（譬如法國大革命那樣），必定會遭致失敗。<sup>42</sup>不過，儘管有機會上的平等，由於人的聰明才智不同，仍將會出現不平等的結果，卻是孫中山全心全意支持的。他認為只有這樣才是「真平等」，因為企圖造成結果上的平等，最後只會變成強迫每個人降到最低的水準，而「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雖然孫中山並未設想中國革命應以平等之名來進行，但是他確實認可「政治上的地位平等」之公正性，並將「政治上的地位平等」等同於機會上的平等。「政治上的地位平等」究竟所指為何？孫中山提議的是，從平等的立足點開始，人們會從屬於八項地位的其中之一，自上而下依序為：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其結論卻回到他從前所指的三重範疇：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以及奉行其領導者指示的不知不覺者。

但為何大多數人即便在政治上是落伍的，仍應該信任他們的領導者會做出正確的事呢？孫中山並未回答此一問題。但他對於人性的觀點，提供了部份答案。儘管天賦之聰明才智是不平等的，孫中山承認民眾的心理卻是追求人人平等，甚至這是「道德上之最高目的」。<sup>43</sup>那麼這該如何達成？此處孫中山注意到人類的兩種傾向：自利與利他。若是「聰明才力之人」，只是自私地運用他們的能力圖利自己，時間一久，就生出專制的統治階級。這是從前的革命所要對付的政治不平等。然而，當那些「聰明才力之人」抱持利他的立場，出來服

<sup>41</sup> 這是在民權主義第三講，《國父全集》，冊1，頁76-88。

<sup>42</sup> 這次演講主要的重點就在於一個本質論式的論證：歐洲一向缺乏自由和平等，而在中國這兩者的發展程度很高（即使缺乏相關的理論）。這是孫中山批評學生們追求並不適合中國國情的西方理想之基礎。他似乎相信在概念的層次上，自由比起平等在中國傳統中更加格格不入。然而，我關注的是這次演講中的另一個組成部份，亦即孫中山討論歐洲和美國革命時的假設。

<sup>43</sup> 《國父全集》，冊1，頁87。

務民眾，那麼慈善的宗教與博愛的活動便會逐漸散播。這仍然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還是得依靠革命來推翻專制，傳播民權，劃一人性。儘管如此，每個人「當」盡力為所有的人服務。那些不是那麼聰明又有能力之人，應當盡力為稍小一點的人群謀福利；至於那些愚鈍無能的人，也仍舊應該試著去為個人謀一己之福利。孫中山總結說，正是透過服務道德心，才有可能在社會的層次上克服天生的不平等。

引人注意的是，孫中山並未提供理由，說明為何我們可以期待那些「聰明才力之人」願意為他人謀福。即使他們「應當」如此，為何他們實際上並不自私？或許由於孫中山假定人性本善，而由民主革命所創造出來的那種良善社會，「聰明才力之人」自然會選擇為公共利益服務。也或許孫中山假定，既然由革命所創造出來的政治體系，最終是主權在民，那麼人民將會防止新的獨裁者產生。這隱含了孫中山主張人民追求平等的陳述。他並未直接表述這些理路，但他所說的足以顯示其目的就是勾劃出革命實踐的一套方法論，以及提供一些對於革命最後目標的看法。因此，先知先覺者或少數的「聰明才力之人」，對於他這兩項目的來說都極為重要。那些先知先覺者，無論是天生的領導人物或經由後天自我形塑而成，都有可能造成極大的危害，這一點已經相當清楚。但對於人類的一種服務道德心，若以革命的方式為之，將能導向「真」平等。

讓我們回到何以將會如此的問題。雖然我們可能會認為這種平等主義式的「道德」缺乏歷史證據加以證明，但孫中山卻顯然相信道德心是內在於人性之中，抑或至少是自然發展而來。如果我們同意，希望見到別人好是一種自然的欲求，那麼孫中山提倡民權的民族主義也是一種強調平等的普世主義(egalitarian-universalism)，然而此種平等主義也是有其限制的。孫中山深深地懷疑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那種「過度的」(excessive)自由與平等。自由與平等在社會中自有其重要性，但在政治組織中則不然。擴大來說，或許在政治中也是完全不必要的。的確，孫中山在某個意義上自認為是平等主義者。他倡言機會的平等，意味著所有人都應當可以將自己的能力發展到極致。孫中山強調對

於人類的服務道德心，暗示著一種家父長式的結果平等，這就是他的「民生主義」觀念。然而，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演講中的基本思維既是菁英取向的，也是相當保守的，不相信有任何事物能夠挑戰其理想中的菁英領導秩序。他的確承認平等和民權有著重要的聯繫，但與此同時，他也無法想像會有缺乏良好領導的民權（這向來是一個關乎「知識」的問題）。沒有一個最後的烏托邦是不需要先知先覺者的。當革命之後，在先知先覺者領導下，將會有持續不斷的進步。

## 先鋒主義與民權

職是之故，對孫中山而言，新的中國革命目標就不應是「自由與平等」的合體，而應該在於民權。因為民權（西方真正的成就）才是具體實踐自由與平等唯一健全的基礎。從某個角度來說，對於孫中山而言，問題並不在於自由與平等本身，而是兩者的過度與濫用。「所以中國國民黨發起革命，目的雖然是要爭平等自由，但是所定的主義和口號，還是要用民權。」<sup>44</sup>但是自由、平等和民權之間的平衡，不能不交由革命實踐來決定。此處孫中山以正面的方式引用歐洲的經驗，將民權與政治組織如政黨和工會連結起來。他並不認為工會為理所當然的經濟力量，反而總是一種政治力量。因為工會源自於爭取自由之鬥爭的一部份，原本便與階級鬥爭相關。但工會需要「好義之士」的領導，依照孫中山的論點：缺乏「好義之士」的領導，工會就會分崩離析。<sup>45</sup>他坦言非常擔憂中國的工人可能會拒絕知識分子的領導。

從如何實踐民權革命的角度來看，孫中山至今為止的論證都依賴如下的前提：首先，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是由漢人主導的多民族國家，解救中國的要務在於建立民族精神與團結。其次，民族精神與團結雖然受到滿清政府的壓

---

<sup>44</sup> 《國父全集》，冊1，頁84。

<sup>45</sup> 孫中山並不擔心為追求物質生活的提高而犧牲革命的「經濟主義」(economism)，而且視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兩者不可分割。但他認為歐洲工會近來轉由工人領導（腐敗且無能），是過度平等與自由的一個絕佳例證。《國父全集》，冊1，頁85-86。

迫，但在太平天國起義（乃至於辛亥革命）的反響中得到復甦。不過，這樣的反響容易回復為帝制。第三，民族主義精神的復甦，必須透過喚醒民眾面對國家所遭受的帝國主義威脅，以及對於過去偉大光輝的記憶。在此一過程中，有可能立基於現有的社會結構如宗族，以不合作的方式來對抗帝國主義強權，並恢復民族固有的傳統道德價值，從而拒斥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第四，建立民權既是要恢復民族精神，也是要開始新國家的建設。換句話說，民權不但是目標，也可以適當地解釋為手段。

孫中山將民權與權力和鬥爭二者相聯繫，視民權為經過神權統治和君主政治之後，文明在長時期不同發展階段的結果。儘管批判世界主義，但孫中山將民權理解為對全球處境的普遍回應：雖然有些民族仍舊缺乏實踐民主政治程序的能力，但是中國人確實有此能力。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孫中山認為民權有別於自由和平等，或者至少有別於自由和平等的過度形式。他相信自由、平等與民權都是獨特的現代西方文明之特點，而且都是出於對專制壓迫的反抗。儘管從未完全實踐，但古代中國曾經發展出民權的概念，中國缺少的是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卻在相當顯著的程度上獲得實現）。簡而言之，中國不需要採取特別步驟來獲得進一步的自由和平等，但應可透過一種共和秩序來從事民主政治。正是在這一點上，孫中山在其民權主義第四講中抨擊聯邦主義與美式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重申他深信中國需要的是一個強而有力但民主的中央政府。<sup>46</sup>同時，孫中山毫無例外地在其第四講和第五講中指出，西方國家自身也尚未達成完全的民主。他的結論僅僅是，中國需要擁有自身風格的民主，應朝此方向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一方面，中國絕對必須實行民權以「順應世界潮流」，走上政治的正軌；然而另一方面，外國的政治制度和學理又不像簡單的機器一樣，可以適用於任

---

<sup>46</sup> 儘管這點在當時的爭論以及後來南京政府的政策裡都很重要，關於此項論證的細節並非本論關注的焦點。孫中山的確期待過一個強而有力的地方政府。我的理解是，他以同樣的理由反對聯邦主義，一如他試圖抑制世界主義與（過度的）自由和平等：因為這些事物似乎威脅到國家主權。

何一個地方。中國的民權必須適合中國的特殊環境，<sup>47</sup>即便西方建立了可靠的民主機制（但又尚未如此），這些機制也是無法轉換到中國來的。然而，西方畢竟是開路先鋒，值得學習。孫中山心中思考的議題之一，是西方民主政體在履行民主承諾上的失敗。<sup>48</sup>但對孫中山來說，更關鍵的一個議題是，西方對於民主的自我設想（或至少在美國），為由人民來制衡政府權力。這樣的政體並不適合中國。孫中山認為，環顧中國歷史，人民總是盼望藉由有才能的人，例如古代的聖王，來復興政府，以為人民謀福利；但在民權思想傳入之後，人民對於舊帝王就不再滿意了。<sup>49</sup>人民不信任所有的政府，孫中山視這種情況為政治進步的阻礙。他了解萬能政府和民權之間的張力，但仍然試圖調和兩者。其解決辦法是區別「權」與「能」：首先將世界上的人分為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和佔大多數的不知不覺者，孫中山斷定不能等待不知不覺者為自己要求民權，必須將民權交給他們。政府託付予專家，亦即有「能」的人，而最終的「權」則保留給人民。人民應該將有能力的政府專家視為他們的僕人，也應該放手讓這些專家領導一個萬能政府。「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sup>50</sup>

在孫中山的革命視野中，先知先覺者及其追隨者的責任在於領導不知不覺的群眾走向民主，同時也是由這些專家來主導政府運作。我們可能會問：那麼由誰來管理管理者呢？在某個層次上，孫中山的回答是：沒有任何人。保留給人民的權利只有選舉和罷免權，孫中山認為這將可以制止權力的濫用。但是對於權力本身的功效，孫中山沒有任何懷疑。孫中山自己注意到，俾斯麥式(Bismarckian)的萬能政府有可能會對民主式的現代化造成威脅。他不要這種

<sup>47</sup> 《國父全集》，冊1，頁103-104。

<sup>48</sup> 像孫中山在他的民權主義第六講中所說，中國不能仿效西方的民主，因為它像舊式的機器一樣是不完美的。《國父全集》，冊1，頁119-121。我們可以說，在1911年之前，孫中山論證君主立憲的支持者想要模仿的是舊式的火車頭（德國、英國），而革命黨要仿效的則是最新一代的火車頭（法國、美國）。如今，他已經準備好為中國促成下一代的民主科技。

<sup>49</sup> 《國父全集》，冊1，頁104-105。孫中山忘了他自己相信，正是古代的聖王將民主的觀念介紹給中國的。不過，他此處談的題目並非民主的歷史，而是民眾的態度。

<sup>50</sup> 《國父全集》，冊1，頁113。

方式，但也不想要制衡權力本身。孫中山引述西方批評家對己身民主社會的看法，認為這些民主社會的人民對於自己的政府太具敵意〔他可能想到伯倫知理(Bluntschli)〕。<sup>51</sup>在他的民權主義第六講中，孫中山也引用當代的非政治專業管理(non-political professional management)的觀念。用比喻的詞彙來說，目標是將行政機關當作機器，機器當然就需要技術人員和工程師加以適當的操作。孫中山是以迂迴的方式來說明人民需要信任專家。值得注意的是：此一關於機器的比喻，同樣隱含了權力的主題。

在其第五講中，孫中山注意到就「權力」來說，民主政治（民權）是君主政治（君權）的對立面。但他所謂的「權」與「能」，最能顯示其意義的不在於其解釋，因為他從未真正對這兩者詳細分析，而是在於他所舉的歷史實例。這些歷史實例從聖王開始，他們體現了權、能（以及道德，也就是熱愛人民）的結合。因此，他們是為人民而服務的。但孫中山的意思是，聖王不能成為今日的模範，因為權力已經屬於人民，而歷史顯示有權又有能的人也不再出現。我們能夠從聖王所學到的東西，是人民對於政府和無私服務的一種信任。更直接的教誨來自於往後的宰相。根據孫中山的說法，有時在歷史上出現的情況是宰相有能，皇帝有權，而皇帝並不會太過干預實際政務。孫中山主要的例子是有能力的諸葛亮，劉備放手讓他從事治理。皇帝之「權」實際上只限於選出對的人。就此而論，民主政治中的人民也是處於同一地位，或許更清楚的例子，是孫中山所提到的現代股份公司。股東（權）所做的不過是選擇出總辦（能），國家就應該像個股份公司。<sup>52</sup>孫中山並不想在有效率但不民主的政府（俾斯麥、明治日本），以及拙劣無能卻保持民主的政府（或許他指的是美國）之間做出選擇。他尋求的是有效率而又民主的方案。他願意付出的代價，則是在人

<sup>51</sup> 伯倫知理(Johann Caspar Bluntschli, 1808-1881)是一位瑞士裔的德國法官，其著作頗受明治日本的保守派人士歡迎，在中國則受到梁啟超的推崇引介。伯倫知理宣揚的觀點是，國家為歷史形成之物，並且是有機的實體。他贊同強力國家中的憲政規範，懷疑民主政治。

<sup>52</sup> 民主國家與現代股份公司之間的相似之處，在辛亥革命之前十年就已經被蔡元培注意到了。他說：「國者，公司也，民者，出資本之股主也，天子者，總辦也。」蔡元培，〈上皇帝書〉，收入高平叔編，《蔡元培政治論著》（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頁12。

民與政府之間劃出一道鴻溝，或者說一方為有權的不知不覺者，另一方為有能的先知先覺者。

雖然很難算得上是激進或直接民主，這仍可稱為一種民主的觀點。不過它似乎無法改善孫中山當時所見的主要問題：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民眾不信任中國那個政府是理所當然的，但諷刺的是，就連孫中山自己也不信任軍閥、帝國主義者、軍隊與腐敗官僚。他對於政府應該得到信任的看法，是一種取決於革命能創造出好政府的政理論。有趣的是，三民主義演講沒有直接談到革命。孫中山並未談到訓政或者教育無知的群眾，而是想像政府的事務對他們來說，將會變得十分容易理解。就像複雜的機器和電力已經前所未有的易於控制一樣，如今「政治機器」也已改良了。在他的民權主義第六講，也是最後一講，孫中山舉出另一個權力的比喻：如今人民做為民權的根源，就像某種巨大船隻之引擎，或是推動船隻向前的原動力；<sup>53</sup>只要整座引擎運作良好（也就是說，民權的引擎帶有罷免和選舉權），其動力就可以增長。孫中山在此不曾說明的是，在國家這艘船裡，船長和船員編組都將保留給有能力的人。他確實曾說：「用機器來做比喻，甚麼是有能力的東西呢？機器的本體，就是有能力的東西，譬如十萬匹馬力的機器，供給了相當的煤和水之後，便可以發生相當的能力。甚麼是有權的人呢？管理機器的工程師，就是有權的人。」<sup>54</sup>雖然堅持主張一切都有賴於權能區分，孫中山在此處卻似乎打亂了兩者的區分。至少人民如今既為這艘船提供動力，又引領它前進，或者至少引領著舵手前進。這是在修辭上（如果不是在邏輯上）立基於一種觀念：現今是屬於「民主時代」，反民主的勢力都在退卻，以致假設管理者皆傾向於不為他們自己尋求權力。無論如何，孫中山在此做了一個新的區分：一邊是政治或政權，另一邊是管理或治權。<sup>55</sup>「政治機器」就像其他機器一樣，有其本體的力量（能量，也就是政權）與管理的力量（控制指導此一能量，也就是治權）。政治力量或能量是從所有

---

<sup>53</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117。

<sup>54</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117-118。

<sup>55</sup> 《國父全集》，冊 1，頁 121。

的人民而來，因此是民主的；而管理力量則是自管理事務而來，指的是政府。

在我看來，孫中山的機械式比喻，並未真的解釋政治領域和統治領域裡的能量、力量、動力，或權力如何相互關連，也不能解釋政治領域和統治領域如何連結到權與能的二分法。然而，孫中山基本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們想要製造出許多力量，利用這些力量來從事偉大的事業。一個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與敵意加以制度化的系統，已經窒礙難行。孫中山承認、甚至強調，政府（治權，能）有別於民眾（政權，無知的群眾），不包含大眾參與的觀念。但特定的制度諸如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能將政府置於人民最終的控制之下。就像現代的蒸汽引擎一樣，設計完善的政治體系可以讓蠢材來使用，只要有負責控制的人介入即可。孫中山說政府是個機器，但並不認為政府只是個工具。

## 結 語

「先鋒主義」不只是一種革命策略，它也是（或者至少可以是）一種統治哲學。然而，先鋒主義做為一種信條出現在現代革命的過程之中，是由於其領導者宣稱代表了公共利益：階級或國族。孫中山並不需要列寧才能理解先鋒主義，儘管他從俄國革命的經驗當中學到許多東西。先鋒主義對孫中山來說，並不僅止於描繪革命的必要性，也不僅僅是標誌出革命所必經的單一「訓政」階段，它毋寧是使孫中山了解到其「先知先覺者」之政治領導權的本質。問題在於，我們該如何調和孫中山的先鋒主義及其民權思想？兩者之間的張力是很清楚的；孫中山所謂的「民權」所指為何，則不是那麼清楚。一種解答是指出孫中山並非專業的哲學家，甚至也算不上是「思想家」。他不過是個行動派，說出許多其實並未經過深思熟慮的看法。

儘管孫中山做為一個思想家和領導者有許多缺失，我們仍然有可能將他四處漫遊的演講活動和組織革命的生涯，視為共和精神的體現。<sup>56</sup>我們也有可能

---

<sup>56</sup> David Strand, *An Unfinished Republic*, esp. chap. 6.

強調孫中山的菁英主義，從而排除他的民權思想。<sup>57</sup>就此而論，在他 1924 年對國民黨的一場演講中，孫中山主張黨治；既然中國缺少的只是一個國家，那麼國民黨就必須建造出一個國家，國家已經造出來了，國民黨就必須加以控制，「把黨放在國上」。<sup>58</sup>孫中山的範例很顯然是俄國。但是黨國體制在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中，是否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則尚不明確。另一個修正過後的解釋則認為，孫中山的民權思想是真實的，但「有缺陷」。<sup>59</sup>

主張孫中山的民權概念被他的菁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illiberalism)所扭曲的觀點有其道理。然而，我們不需要聲稱孫中山是個深刻的哲學家，也能察覺到此種論點的前提在於一種對於「民主」的狹隘定義：只能是自由主義式的政黨民主政治。孫中山思想的歧義性(ambiguity)，容許學者們將之視為中國共產黨強大的黨國體制創造過程中，以及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的一項要素。<sup>60</sup>況且我們必須容許孫中山有不時改變他的主意的權利。我們仍然可以總結說，孫中山大體上採取的是一種非自由主義版本的民權，根植主權於人民之中，並且在由國家領導者所建立的界限中，努力尋求促進此一普遍民權的政治機制。用非常概括性的語彙來說，孫中山的觀點是屬於盧梭 / 馬克思的傳統，而非洛克 / 彌爾(Locke-Mill)的傳統。<sup>61</sup>就此而論，他既未曾談及總意(general will)，也不

<sup>57</sup> 橫山宏章，《孫中山の革命と政治指導》（東京：研文出版，1986）。

<sup>58</sup> 《國父全集》，冊 3，頁 413。另見：橫山宏章，《中華民國：賢人支配の善政主義》，頁 51-56。

<sup>59</sup> Audrey Wells,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59; A. James Gregor and Maria Hsia Chang, "The Thought of Sun Yat-se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un Yat-sen's Doctrine in the Modern World*, p. 127. Wells 和 Gregor-Chang 都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基本上是民主的〔Gregor-Chang 說：在某種程度上「根本是西方式的民主」(p. 119)〕，但有缺陷。儘管我同意我們必須認真看待孫中山的民權思想，但將之比喻為西方式的民主，著實荒謬。

<sup>60</sup> 關於前者，可見：山田辰雄，〈序論——現代中国における代行主義の伝統について〉，《歴史のなかの現代中国》；關於後者，則可見 Thomas A. Metzger, "Did Sun Yat-sen Understand the Idea of Democracy?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in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American Asia Review* 10:1 (spring 1992), pp. 1-41.

<sup>61</sup> 我在此使用的是勉強將就的分析性標籤，而非追尋思想上的系譜。認真看待孫中山之非自由主義與民權思想的極少數學者之一是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Did Sun Yat-sen Understand the Idea of Democracy?"一文。然而，墨子刻自由主義式的將民主與「開放的政治市場」相結合，幾乎沒有為孫文主義式的民主視野留下空間。

贊同平等主義，但是他假定政治共同體的根本統一(essential unity)。他的民主 / 民權認定公共利益有別於個人利益的總和。

隨著辛亥革命的到來，孫中山思想中的孔德式(Comtean)理念也逐漸明顯，也就是認為人類社會可以依照科學的方式來加以重建。<sup>62</sup>我想到的傳統並非從孔德到斯賓賽(Spencer)與馬克思，而是從孔德到費邊社(Fabians)與拉斯基(Laski)，特別重要的是需要找到變革的原動力。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確實為孫文主義提供了洞見。<sup>63</sup>同樣正確的是，孫文主義這個可塑性甚強的學說，也相當直接地立基於中國革命的發展。但孫文主義也必須放在其所處的國際脈絡來理解。這些觀點並非互不相容，也不是說它們提供了一個明確的途徑以探索孫中山思想的價值，或成為傳遞判斷的工具。<sup>64</sup>此處，我的目標僅在於以孫中山之於二十世紀中國史的重要性為前提，由此出發，扼要地闡述他對於革命組織和目標的看法。他的活動和思想在辛亥革命期間還相當邊緣化，最起碼在 1910 年代以前，還沒有所謂的孫文主義。孫文主義是隨著被孫中山視為失敗的辛亥年之後，才由他一人所提出、或多或少算是獨特的革命學說。孫文主義萌芽於 1911 年之前，但應該算是革命派的一般意見；在 1911 年之後，孫文主義開始變成一種學說，至少逐漸朝向徹底的理論化發展。

孫中山將其先鋒主義同時應用於革命黨，以及隨之而來的憲政秩序。他的

<sup>62</sup> 這並不是說孫中山閱讀過孔德的著作（就我所知，他不曾讀過），而是說他曾經廣泛閱讀當時的政治文獻，這些文獻都是循著實證主義發展出來的。

<sup>63</sup> 不僅一般來說是如此，就孫中山的認識論而言也是如此。關於前者，可見：Ying-shih Yü, "Sun Yat-sen's Doctr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Sun Yat-sen's Doctrine in the Modern World*, pp. 79-102; 關於後者，則可見：Thomas A. Metzger, "Did Sun Yat-sen Understand the Idea of Democracy?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Democracy i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in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American Asia Review* 10:1, pp. 12-22.

<sup>64</sup> 既然孫中山的觀點「是一種對籠罩在二十世紀初的世界上確切之歷史、社會和經濟挑戰的回應，所以與整個西方世界及其周圍所出現的革命意識型態有著某些相似性。」A. James Gregor and Maria Hsia Chang, "The Thought of Sun Yat-se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un Yat-sen's Doctrine in the Modern World*, p. 106. 我願意更進一步說，孫中山的著作應該被視為社會主義、準馬克思主義和準法西斯主義之國際性革命對話的一部份。孫中山同時反對自由民主與馬克思主義，因為不適用於中國的情況（在其早期生涯中，孫中山顯示出更多的自由主義徵象。在一封 1900 年討論政府的信件中，孫中山論及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見《孫中山全集》，卷 1，頁 193-194。應該注意到的是，他總是在批判專制政體）。

先鋒主義在後來的憲政發展中還不如在訓政階段中來得明顯。然而，正如在 1924 年的許多場演講中所闡述，孫中山強調專家、「先知先覺者」、「能」的角色，並將之應用於後訓政的憲政主義(post-tutelage constitutionalism)當中。實際上，孫中山政治觀點的認識論基礎，在其 1918 到 1919 年間的《孫文學說》就已顯示出來。後來，他將「先知先覺者」聯繫到「知難行易」的格言上。1912 年，隨著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自認他的工作已經完成。因為他認為革命背後的基礎為民眾動員，以及代表中國人民團結一致的民國，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任何反對時代的趨勢都注定是要被擊敗的。袁世凱的崛起讓他學到教訓，但袁氏的垮台也更加印證了自己的觀點。<sup>65</sup>

孫中山也許並未創造一個意識型態或「主義」，但他的學說的確有助於建立現代中國黨國體制的基礎。他所憧憬的一種非自由式的民主，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可以歸因於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民族主義運動這兩種政治潮流。就後者來說，他自己就是主要的代表。孫中山對革命的理解有賴於一種認識論上的菁英主義，它不僅形塑了他對革命組織的看法，也形塑了他對憲政秩序的看法。對孫中山來說，後者不僅僅包括政治統治的機構，還包括了急速而大規模的經濟發展，必須在社會主義的參照下，「民權」才能被理解。

---

<sup>65</sup> 《孫中山全集》，卷 3，頁 318-319。

## **Democratic Thought and Vanguardism: Sun Yat-sen's Political View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Peter Zarrow<sup>\*</sup>

### **Abstract**

The mature political thought of Sun Yat-sen was simultaneously committed to democratic principles and to a vanguardist vision of revolution that influenced his vision of a future constitutional order. Although Sun's political writings and speeches were often ambiguous and self-contradicto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in issues of concern to Sun in the 1910s and 1920s. Sun believed in vanguardism before the Guomindang was reorganized as a Leninist party, and he based his vanguardism on a coherent epistemolog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iberal democracy, it seems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vanguardism are in tension. However, illiberal democracy—preserving popular sovereignty while emphasizing strong leadership—was widely attractive to cosmopolitan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it was logically based on an optimistic teleology that postulated the world-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Keywords: Sun Yat-sen, vanguardism, revolution, democratic thought, illiberal democracy**

---

<sup>\*</sup>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